



## 工业题材小说佳作:精读与发现

□李 雪

《原动力》和《乘风破浪》、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等长篇小说。它们受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关注工业生活中的先进与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专注于塑造共产主义新人,但画卷宏伟,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主要由改革文学浪潮推进,影响很大的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三千万》等。这些小说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工业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揭示了改革的艰难,也反映了人自身观念变革的过程,塑造了工业战线的新人形象。而上世纪9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主要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些作品为代表,如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

据现代工业生活的问题,现代的大工业日益机械化、数字化,人的因素日益薄弱甚至成为机械的附属,作家很难深入到封闭的现代大企业中去了解第一手材料,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到厂矿去蹲点体验生活也难以实现。既有的工业题材小说由于没有较好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较自觉的理论引导,容易陷入自我重复之中,出现明显的类型化倾向。为了促进工业题材小说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厘清几个基本问题。首先,工业题材小说依然要以人中心。蒋子龙曾说:“即便是工业题材,最迷人的地方也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生命之谜构成了小说的魅力。”当然,这是受工业生活影响和塑造的独特的个人。也就是说,要从工业生活角度展示出人性的独特性、普遍性乃至超越性。其次,需要进一步确立人文精神的批判立场。工业文明对于现代人的异化是应予关注的,此外如在现代工业侵蚀下广泛出现的自然生态危机等,都需要作家加以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例如英国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和美国奥尼尔的戏剧《毛猿》都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人文批判的力作。再次,当下的工业题材小说应当具有宏阔的全球化视野,因为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工业与全世界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了,单就一个车间已经无法理解工业生活了,就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那样。

“十一五”结束时,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整体上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工业化浪潮气象万千。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把那些受工业生活影响和塑造的人性景象以最美的文学样式呈现出来,让人能够真正在精神上超越工业化,获得自由和幸福。

2010年10月,作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引起广泛关注。小说把中国沿海工厂的小老板、管理者和工人的生存境遇放置在全球化背景下,来审视其希望与失望、梦想和死亡。小老板经营的小小制衣厂因为香港人赖查理拖欠货款濒临倒闭,工人纷纷跳槽,正当小老板一筹莫展之际,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急需大量的美国国旗。赖查理带来了一份加急的国家订单,小老板以为借此可以打个翻身仗,便督促工人加班加点,5天5夜连续工作,中间只休息了4个小时,最终虽然完成了订单,赚到大钱,但身体较弱的工人张怀恩却因加班过度劳累而死。小老板也因无法承受压力而欲欲自杀。该小说触笔细腻,构思新奇,叙述绵密,是一部揭示全球化时代工业生活的优秀作品。

我们还惊喜地发现,2010年底有两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面世:刘华的《车头爹车厢娘》和肖克凡的《生铁开花》。前者堪称一部中国铁路人的成长小说,它反映了自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蒸汽机车时代至90年代末以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为标识的“后蒸汽机时代”的铁路生活,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背景下叙写了三代铁路人的成长历程。小说以奶奶的人生命运为叙事线索,在半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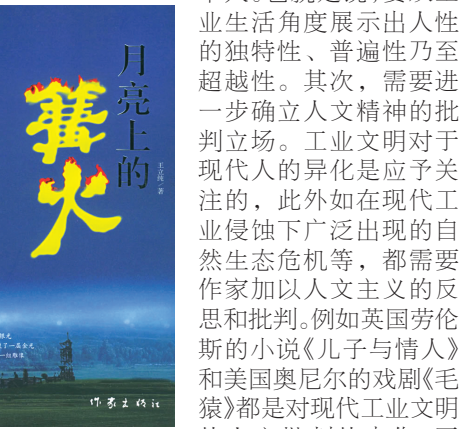


多世纪的时空背景下,细致呈现了几代铁路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伦理。后者的新意则在于于“体制与人”的层面剖析了国有工业企业的命运演变,细腻而深切地揭示了产业工人从捧着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到经历转制、竞争等痛苦的蜕变这一过程。作者巧妙地选取文工团员转为国企工人的身份变化和心理蜕变展开叙述,娓娓道来且蕴涵着厚重的文化韵味,折射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当代作家在工业题材创作上的不懈追求和艺术表现是令人钦佩的。实际上,工业题材小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中无疑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作家都曾经创作过描写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作品,较著名的如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

《寂寞歌唱》、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它们主要描绘了社会转型期工人的艰难生活和理想追寻。新世纪以来,较重要的工业题材小说主要有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焦祖尧的《飞狐》、肖克凡的《机器》、贺晓彤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曹征路的《问苍茫》、刘庆邦的《红煤》、李锐的《长门芳草》、王十月的《无碑》等。这些作品视野更为开阔,有的叙述工厂史,有的询问社会发展道路,有的关注人的终极意义,有的展示工人的英雄主义风格。

不过整体看来,工业题材小说相对于乡土题材、历史题材、都市题材乃至军旅题材而言,在当前文学创作中仍居于一种弱势地位,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实际水准与壮阔的工业化进程不相适应。当然,这其中有些作家难以把



《寂寞歌唱》、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它们主要描绘了社会转型期工人的艰难生活和理想追寻。新世纪以来,较重要的工业题材小说主要有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焦祖尧的《飞狐》、肖克凡的《机器》、贺晓彤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曹征路的《问苍茫》、刘庆邦的《红煤》、李锐的《长门芳草》、王十月的《无碑》等。这些作品视野更为开阔,有的叙述工厂史,有的询问社会发展道路,有的关注人的终极意义,有的展示工人的英雄主义风格。

不过整体看来,工业题材小说相对于乡土题材、历史题材、都市题材乃至军旅题材而言,在当前文学创作中仍居于一种弱势地位,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实际水准与壮阔的工业化进程不相适应。当然,这其中有些作家难以把

## 当下工业题材书写的新收获

——评刘华的长篇新作《车头爹车厢娘》

□李洪华

重点  
阅读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工业题材”是一个在特定年代产生的具有特殊历史内涵的概念。自上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也已进入到一个以信息技术为表征的“泛工业化”时代。代表着现代生产发展水平的信息工业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面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工厂、工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形态和内涵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因而,在“泛工业化”的时代语境中,“工业题材”书写应如何面对新的生活现实,这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泛工业化”语境下,刘华推出了他的长篇新作《车头爹车厢娘》,作者以厚重的生活积淀、深挚的情感体验和非凡的诗意想象为我们呈现了铁路工人别样的生活世界,搭建起久被遮蔽的精神空间,为我们提供了“泛工业化”时代新的叙事伦理,昭示了当下工业题材书写新的可能与期待。

作为铁路人的“后裔”,刘华至今也无法稀释那浸透在血液中的对于父兄辈铁路人生和青春往事的怀想与敬畏。在《车头爹车厢娘》中,刘华怀着敬畏之心向记忆深处索取,用深挚情感穿透一个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小说以奶奶一家三代铁路人的生活故事和命运遭遇为主线,以合欢车站铁路新村为中心,叙写了自抗战以来半个多世纪各类铁路人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

《车头爹车厢娘》带给我们的惊悚体验首先来自那一次次潜伏在火车呼啸和汽笛长鸣中的“偶发事故”。刘华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

的想象把一系列死亡事件搁置在一个特定的话语空间,呈现出令人惊悚的场面和繁复的细节。从一开始孙大车被地雷炸死在桥头,到后来港背村老表被火车轧死在道口,范莹莹被鞭炮炸死在车站、姚杭州被油罐车碾碎了双腿、颜大嘴死于被列车惊吓的水牛的顶撞、陈连根死于山体滑坡时的跳车、孙枣儿死于亡命之徒的刺刀等等,一系列火车伤亡事件构成了《车头爹车厢娘》的一个显性叙事层面。刘华不但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想象直面每一个令人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更以深切的敬畏和悲悯反思蕴藉其间之生命之痛和人性之悲。孙大车的死缘于“很平易的一个应允”,但它却“决定了孙家和张家后来的命运”,也决定了奶奶此后漫长艰辛人生的开始。港背村老表虽然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生命,但众多的火车头都自觉地为他逝去鸣笛致哀。年轻活泼的列车员范莹莹还未来得及绽放青春的光彩,便被永远定格在22岁的生命台阶,几十年如一日地成为“旅客违禁携带易燃易爆品”的警示符号。默默无闻了大半辈子的巡道工颜大嘴在结婚的当天为救火车,被惊吓的水牛角顶死,那些涂抹在墙上的“文字垃圾”表达了一个单位、一群人对于平凡的生命个体的最后记忆”。刘华深知文学的魅力既来自生活的神圣性构成,也交织着无常的神秘性存在。小说中,代人出车的孙大车儿时竟然揣着女人做鞋的鞋楦。在颜大嘴送葬的途中,穷追不舍的自行车和吉普仿佛是为命运驱遣的某种神秘物,让死去的颜大嘴对生前的足迹作最后的检索。而弥留之际的奶奶竟然光返照,“已不利索的口舌,出奇地流畅而机敏,眼里也泛起丰富而生动的波光”。在《车头爹车厢娘》中,“死亡”这个具有宿命论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既包含着无数个人生的偶然,又无时无刻不指向一切命运的必然,即便是坚韧顽强的奶奶也不例外。

在很大程度上,《车头爹车厢娘》可谓是一部中国铁路人的成长小说。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代铁路人孙大车、张大车等是为了谋生不自觉地投身于铁路,那么对于那些自觉选择铁路的后辈们来说,则完全是来自一种与生俱来的诱惑与自觉。在“小火车”的警告和叮咛中长大的铁路子弟们,始终“无法抵御火车的巨大诱惑”。孙安路、张卫国、孙枣、孙庄、杭州、金华、孙鹰、孙夏等一代又一代铁路人前赴后继,自觉地投身于铁路,并为之奉献出青春、梦想甚至生命。《车头爹车厢娘》正是在几代铁路人直面离散人生和淋漓鲜血的自觉选择与默默坚守中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与感动。

历史的真实往往流淌在大众日复一日的点滴生活中。要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文

明进程,应该“关注公共舞台后的私人空间,追寻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脚步下深深埋藏的生命痕迹,去揭示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视、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虽然《车头爹车厢娘》反映了中国铁路工业从蒸汽机时代到内燃机时代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小说中也不乏抗日战争时期的岁月烽烟和特殊年代的社会面影,但很显然,向来擅长以舒缓笔致挖掘民间文化遗存的刘华既无意在高远的历史天空谱写中国铁路工业的英雄史诗,也没有一味停留在诸多火车伤亡事件中咏叹平凡生命个体的悲恻人生,而是进一步把逡巡的目光投向了站台后面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铁路工人及其家属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小说以奶奶的人生命运为叙事线索,细致呈现了几代铁路人既琐屑又温馨、既脏污垢垢又生气淋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伦理。作品中的枣庄奶奶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乌苏娜祖母一样,既是家族生存繁衍的承担者,又是铁路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在她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充分彰显出母性的坚韧与孤直、智慧与善良。不管是战乱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在山东老家,还是迁居南方,奶奶都凭借着娴熟的针线手艺养家糊口,坚韧地度过漫长的寡居岁月。刘华不但以罕见的细腻展示了奶奶娴熟的针线手艺,而且以少有的耐心描写了奶奶对亲人的爱与恨,对友邻的仁与义。奶奶因寡居艰辛而对安路、安芯、孙枣、孙庄等儿孙辈偏执的爱,因丈夫被炸身亡而对张大车和妹夫两家人执拗的恨,因饱经沧桑而对于金水、颜大嘴、梅香等邻里的关心与照顾,尤其是在流离岁月中始终怀揣着丈夫去世时携带的鞋楦,以及她那伴随一生的“苍凉房间”,都无不真实地露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持守内心的伦理传统。

由奶奶所昭示的前工业时代的乡土中国的伦理传统同样也在铁路新村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显现。当我们为奶奶“偏执的爱”与“执拗的恨”寻找传统伦理的支撑时,也会对张大车夫妇潜藏内心多年的自责内疚、孙安路与秀平夫妻的相濡以沫、安芯在杭州患难时的执子之手以及于金水对安芯不离不弃的相望守候等人性的温暖与诗意的感动产生了一种于心的会意。刘华笔下的铁路新村融汇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那些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以钢铁动脉为纽带集结在“新村”,成为新的邻里。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各自故土的风俗人情,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的磨合中构建新的伦理。“新村”既是铁路人生存的“家园”,也是他们流动的“故乡”。

虽然刘华曾在红色土地上重塑过“母亲的群雕”,也曾在那旧村落里寻访过“灵魂的居所”,但对于出身于铁路世家的刘华而言,只有《车头爹车厢娘》才让他真正回到了精神的原乡,找到了栖居之所。在这部蕴藉着生活

力量 and 人性温暖的厚重之作中,作者撇开浮嚣的当下越过岁月的风烟,沉静地回到精神原乡——铁路新村。然而,刘华笔下的铁路新村不同于沈从文和莫言等人笔下的乡土故园,既不见如诗如画的山水风物,也没有神奇瑰丽的人生传奇,它不过是铁路人流动的“车厢”和人生的“驿站”,作者所着力营构的是几代铁路人的生活地图和精神谱系。然而,正是这些日常的生活地图和平凡的精神谱系蕴藉着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和感人肺腑的人性光辉。奶奶一家三代以及颜大嘴、于金水、陈连根、张段长、范站长、杭州等一系列普通铁路人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理想、牺牲精神、英雄气质和传统美德,既折射出过去那个特定时代的生活意义,也映照出当下社会缺失的时代精神。

工业题材书写向来是当代文学中的薄弱一环,而铁路工人生活更少见当代文学的想象空间,在60年的当代小说历史进程中,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惟有一部在革命历史想象中书写铁路英雄传奇的《铁道游击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反映半个世纪中国铁路历史进程和生活纹理的《车头爹车厢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然而,《车头爹车厢娘》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何写”与“写得怎样”是比“写什么”更重要的文学维度。在上世纪50年代常明、周立波、艾芜等人的工业书写中,日常生活所携带的传统伦理总是无法经由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建中生长出来,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消除工人在特性、个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上世纪80年代,蒋子龙、张洁等虽然能够突破50年代车间文学的叙事模式,把工业书写从逼仄的工厂延伸到开阔的社会,但仍然无法让它与更广泛的生活大地和文化血脉相融合。叙事常常能改变人们对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一种叙事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和实践性的伦理构想,“所谓伦理其实是一种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叙事伦理则“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文本的叙事伦理常常能现出创作主体所秉承的文化立场、价值观念和叙事姿态。通过《车头爹车厢娘》所讲述的三代铁路人的生活故事和一系列“个体生命破碎的呢喃”,我们不难透视出泛工业化时代语境下作者所持取的文化立场和叙事姿态,刘华分明是在试图把乡土叙事的经验融入到工业题材的书写,以传统的乡土文化理路建构当代铁路人的新村伦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刘华的《车头爹车厢娘》为我们提供了“泛工业化”时代的叙事伦理,昭示了当下工业题材书写新的可能与期待。

书香茶座

## 从《生铁开花》想起的

□肖克凡



去年8月,我终于完成了《生铁开花》。有人问生铁怎么会开花呢?我学过金属学和金相学,生铁是指铁,北方俗语所说的“熟铁”才是钢。铁与钢的本质区别,在于铁含有“自由碳”,钢不含有“自由碳”而只含有“化合碳”即“碳化三铁”。我固执地认为,没有被化合的“自由碳”,理应开花。

这部长篇小说我写了四个年头,这是第三稿。其实在第二稿时,它即被影视公司购去电视剧版权,准备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但是我依然修改了第三稿,颇有搞好售后服务的意思。

我将这书稿交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天清晨我突然问自己究竟写了一部什么小说。我本应当在构思阶段这样问自己,现在书稿成了,我却寻思起来。

任何事物都有惯性,人也一样。依从多年形成的思维习惯,我告诉自己《生铁开花》是一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很长时间以来,我被文坛称为工业题材作家。回望自己的写作路程,我觉得自己并非专情专意的人,二十多年间也写了不少其他题材的小说,甚至“爱情题材”和“通俗题材”,然而我还是被认为属于工业题材作家。

这可能与早年我发表中篇处女作《黑砂》有关,后来又写了一批以工厂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包括前几年的长篇小说《机器》。是的,我确实是个写工业题材小说的人。

这十几年来,据说所谓工业题材渐渐成为稀有题材,所谓工业题材作家也渐渐成为稀有物种。根据“物以稀为贵”的世俗生活逻辑,举凡稀有的玩意儿,由于存栏率低往往容易获得行市。

但是,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并未明显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工业题材与农村题材相比,难以呈现大自然景观,不外乎冰冷的机器、乏味的流水线、繁复的生产操作,缺少人类日常生活的魅力和风光。

一天,我在网上读到评论《机器》的文章,引发了我的思考。有评论说《机器》的作者几乎是在用乡土小说的笔调与趣味,描写着工厂和工人的日常生活,具有强烈的世俗生活气息。是啊,回想我在写作《机器》时,的确忘了这是所谓“工业题材”,只是依照自己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呈现着一个个生活在工业背景下的人物和情节,写出了这部未被概念界定的长篇小说。这样看来,我不属于思想型作家,也不属于具有宏大叙事能力的作家,甚至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工业题材”作家。我的小说人物与情节,只是发生在工业背景下而已。

从此说到所谓文学题材的划分,我认为它更适合高校中文系教学和文学研究的需要。就题材划分而言,它对作家的写作可能起不到什么具体作用。这就是概念的意义。

去年8月交了三稿,我跟电视剧《生铁开花》的策划人张谦通电话。他告诉我,这部40集电视剧大纲还在修改,必须着力加重剧中人物青春期的戏份,以强化激情年代的意味。听罢这位仁兄的高论,我深有同感。

放下电话我突发奇想。我这部长篇小说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人物青春期的生活,比如他们在文艺宣传队演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另有三分之二篇幅描写了人物们的成长经历,比如他们走进国营大厂成为各式各样的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称《生铁开花》是一部“成长小说”呢?

我又想到,《生铁开花》的故事背景从1972年起始,写到20世纪末,那时我的人物们也只是接近中年边缘。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说这是一部“青春小说”呢?

不,尽管只在工业背景下描写了一群年轻人的成长经历,《生铁开花》仍然属于工业题材小说。我们历来就是这样界定的,虽然多年来被我们界定的所谓工业题材小说越来越少。为什么越来越少呢?看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前些天,一个朋友推荐英国作家安德鲁·米勒的《无极之痛》,我立即网购并且读了。这部走红西方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个自幼毫无疼痛感的男人从生到死的离奇经历。令我惊讶的是在这部小说封面的推荐语里,西方权威书评机构称它为“流浪汉”小说,又称它为“文人小说”,还称它为“一部‘成长史’”。这不同的命名,使我或多或少明白了几分道理。

一个事物是被命名的。有时候,一个事物有着并不相同的命名。日常生活里,人们往往根据据以为常的方式给事物命名。一个人的一生经历着命名和被命名的过程,小说和写小说,也是这样的吧。

观察中国文坛十几年以来的文学作品,我看到一部部被命名为“低层叙事”或“农民工题材”的小说,它们以农民工进入城市工厂打工为背景,着力描写人生命运,展示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营企业渐渐消失,工厂大多变为私营性企业,以往所谓“工业题材”小说所表现的工业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民所有制时代的工人阶级变成“工薪阶层”,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变成“老板”们的家产。一公一私,时代变迁了。

时代变迁了。那些本来应当也被列入“工业题材”范畴的小说们,往往被“农民工题材”和“低层叙事”所命名,以新品种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以往的所谓工业题材成为“稀有题材”,甚至被新闻媒体称为工业题材的写作陷入“瓶颈”。

是啊,以产业为背景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完全可以继续被界定为“工业题材”,但是面对社会巨大变化,这个被界定的“场”似乎没有及时扩容。你看,一个进入城市在工厂做工20年的“农民工”,完全是合格的工人了,却依然被称为农民工,语语固执地强调着他们的出身。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从农村来到城市做工的人,很早就被称为工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很多是从那个群体中产生的,比如著名的全国劳模、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

时光延绵,世界犹存,事物命名继续。这正是我从《生铁开花》所想起的:在中国文学大家庭中,我们的“工业题材”肌体,是否应当注入新鲜血液?我们的“工业题材”作家队伍,是否应当接纳新生力量?多年以来习以为常的命名习惯,也可能是造成“题材稀有”和“后继乏人”的原因之一。其实,河流里有很多的鱼儿,森林里有很多的鸟儿。

让鱼儿成为鱼儿,让鸟儿成为鸟儿,鱼儿就是鱼儿,鸟儿就是鸟儿。当然,我也不反对呢称,就像身边有人叫我“大肖儿”一样。